

·云冈文化研究·

观音堂和明清时期大同地区的观音信仰

高晓凤

(大同市古建筑文物保管所, 山西 大同 037000)

摘 要: 观音堂是大同市现存始建年代最早的专门供奉观音菩萨的佛教寺院。从该寺院现存的明清时期的碑刻中, 不仅可以了解观音崇拜在我古代的演变过程, 而且也可以看到明清时期大同地区观音信仰的普及、特点以及深入民心的原因。

关键词: 观音堂; 碑刻; 信仰

中图分类号: K878.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882(2009)05-0035-04

观音堂位于大同市城区西南 8km 的蛤蟆湾, 寺院建于武州山北麓的一座山岗上, 面临十里河, 随地形高下形成两处院落, 整体建筑坐北向南, 占地面积约 2000m²。在寺院的中轴线上, 依次建有山门、对台、腰门、观音殿和三真殿, 自前向后排列有序, 迭层升高, 总体布局紧凑合理。山门设在中轴线东侧, 而且低于寺院平地, 其位置不同于一般寺院布局, 独具匠心。

观音堂始建于辽重熙八年(1035 年), 辽末保大二(1122 年)毁于兵火, 以后历代均有重建。现存建筑系清顺治八年(1651 年)由时任宣大总督的佟养量主持重修。寺内现有雕像均系石雕, 正中观音立像高达 6m, 彩饰贴金, 完好无缺, 神态端庄秀丽, 头饰花冠直达层顶。左右立着胁侍菩萨各两尊, 高 2.8m, 面貌丰满圆润, 衣纹流畅, 均为辽代遗物。东西两侧伫立着 5 尊明王, 又称十大金刚, 各高 2.5m。古代的工匠们以精湛的雕刻技巧, 雕塑出多头多臂, 一头多面, 多目露齿的可怖形象, 个个怒目握拳, 手持各种法器, 威武雄壮, 显示着护法神的威严。寺内现存碑刻 9 通, 其中时间最早的为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由原山西提学副使陈所学所撰的《云中城西十五里观音古刹碑记》(以下简称“万历碑”), 其次则为清顺治八年(1651 年)宣大总督佟养量所撰之碑(以下简称“顺治碑”)。这两通碑刻在

清顺治九年(1652 年)由阳和知府胡文烨编撰的《云中郡志》中并无记载, 特照录如下, 以飨读者。

“万历碑”全文如下:

云中城西十五里观音古刹碑记

盖西方十万亿国土有佛名阿弥陀, 其佐阿弥陀(陀)而行化若宰执储贰然者, 曰观世音大士, 又曰光世音, 称号不一, 要以缘德标彰显无方之用, 其义固一也。我大士之得道也, 实始於无央数恒河沙劫前一世尊, 亦号观世音者, 度而教之, 从闻思修入三摩地, 繇三空智尽灭谛理, 因而超越世界, 获二殊胜上, 合十方诸佛之觉, 同一慈力, 下彻六道, 众生之异境同一悲仰, 自是而成三十二应, 入诸国土, 变化显现, 周满婆娑。自是而令众生获十四种无畏功德, 一切兵戈水火险盗狂鬼之害, 以致寿考富贵子女之求, 莫不罄我愿力, 俯顺兆情, 是以道成, 而世尊默许之。为放五体宝光, 远灌十方微尘, 又为之印证, 俾同师号, 曰观世音, 助以禅法, 扬化我大士, 乃巍巍乎, 皦皦乎! 若鹫岭之标, 众峰望月之夺列宿, 而此阎浮提之界, 四光天之下, 一切含识窍而负血气, 莫不知尊且亲者, 其神明之奚啻人臣之於大君, 其怙恃之奚啻赤子之於慈父母, 匪偶然也。云中城西越十五里之遥, 有观音

收稿日期: 2009-06-28

作者简介: 高晓凤(1966-), 女, 山西大同人, 文博馆员, 研究方向: 地方文史。

古刹，流传原地名蝦蟆石湾，怪物数扰害其间，民用不宁，道路阻塞。金重熙年(应为辽——笔者注)之六月又九日，忽大士现丈六金身，偕左右菩萨明王从秦万佛洞飞往水门顶山头，从此妖魔降灭，地方宁谧。父老聚族而议，山势峣岬，不便修庙貌，请得移平地便。旋蒙神显灵异，顿徙坦途。繇是大众鳩工立寺，每逢六月之十九日，遐迩男女，顶礼朝谒，肩相摩於道。盖所传即未谂尽确，而大士之方便拯救刹那显化，政其慈力悲仰之昭彻，处理或有然者。第时久事湮，勒石湮灭不可考。余备兵云中四载奇，不时从二三君子瞻谒其下。一日，众王孙来求为记，垂示永永，业已心许，而偶缘南移未果。呜呼！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倾耳而聆之，亡闻也，然不敢以亡闻议也。八万四千烁迦罗首，八万四千母陀罗臂，八万四千清净宝目，抉睫而察之，亡见也，然不敢以亡见议也。观不取色，音不受听，圆通广大，变化灵应，是故谓之观世音，谓之观自在，谓之光世音也。若夫拯难救灾，特其一端耳！余窃不揣，聊因众王孙之请而备及之，以示夫皈心供奉者同志，则先民部今观察杨公名一葵，闽之漳浦人，元戎焦公名承勋，本里人。万历三十五年丁未岁孟春月吉旦，赐进士第、通奉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前奉敕分巡冀北兵备道、山西右参政、提督学校副使、云杜陈所学顿首拜撰。

“顺治碑”全文如下：

观世音菩萨以声闻大觉，普济大千世界，遍五顷练(?)四大海离诸苦恼，众生口念大悲宝号，随声解厄，不爽毫厘，若千百亿身然。故苏文定公云，非千万亿之身无以示无身之至，故散而为千万亿身，化而为八万四千，虽一身不能成二佛，而一佛能以遍沙河诸国，非有他也，触而□感而能应，所以然者，亦不外乎大极之理而已，又何疑乎！是以我佛如来赞叹观世音菩萨感力弘大，人当供奉，福德不可思议，诸如普天大地之间，并建行宫皈命顶礼者，良有以也。如大同西距十五里蝦蟆湾，旧有观音菩萨及十大明王像。叩之

土人云，像自秦之万佛洞飞来，缘此地妖孽为害，岁讐而至，崇即寝灭，斯非千万亿化身以声闻大觉者乎！然庙創於拓跋氏，迄今兴废游臻而法像犹存，似不能与世推移也明矣。余自兴朝定鼎以来，戎子授间书以平逆乱，总督三云，瞻仰胜迹，见其貌倾圯而法像亦稍为风雨所侵，倘因循久之，既不能以妥神灵之威仪，而名山大观恐亦随之而堕，如是目仰而心动，在一瞻拜之间，若有不容已也。遂兴念重修，为众生造福之本，以广善果，因而捐资鳩工。幸所属诸员忻然乐助，随告成兹殿。虽造影(?)装像为肖陋小，不过踵前人之迹，不使废弛，犹可为大士降趾之地，使众生得所瞻仰皈依，是虽火(?)宅(?)□清凉之一梯，非敢妄□□□论也。惟惜殿后之倾颓者，力不及志，留俟后□同志，□大清顺治八年岁次辛卯仲夏之吉，钦命总督宣大山西、兵部右侍郎佟养量谨撰，阳和兵备道陈弘业，督标中军副将范瑯(比字原碑漫漶不清，此据《云中郡志》卷五“秩官志”补——笔者注)，协守阳和副将彭有德，阳和府知府胡文烨，大同知县王度，众信(共 57 人，姓名略)。

除此以外，寺内现存比较重要的碑刻尚有：清乾隆二十八年碑、清道光二十三年碑和清光绪二十六年碑等。碑刻的时间跨度从 17 世纪初直到 20 世纪初，涵盖了明代后期和整个清代，时间长达 300 余年。虽然这些碑刻绝大多数为小规模维修时善男信女们捐资助力布施的记录，但我们还是可以从看出，当时人们对于观音菩萨的崇敬和信仰之情。

二

“观音”原名“观世音”，是梵文 Avalokitesvara 的音译，亦译“光世音”和“观自在”。据佛经说，观世音原为印度一位国王的长子，名叫不眴。他们父子三人合成为“西方三圣”。根据《法华经》记载，不眴之所以改名，是因为他“苦恼众生，一心称名，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以是名观世音。”可是到了唐朝，唐太宗的名字叫李世民，观世音同他重了一个“世”字，尽管观世音是佛教“西方三圣”之一，但因为李世民是人间的皇帝，于是不得不避讳，改名为“观音”。

观世音是什么时候由男变女的呢？在唐初史学

家李百药的《北齐书》中，已经提到南北朝时北齐武帝高湛卧病期间，曾梦见观世音是位亭亭玉立的美妇人。且不论高湛是否真的做过这个梦，但在唐代以前，将观世音绘成女身的画像已经见于民间。因为在佛教信徒看来，阿弥陀佛的地位似乎太高了一些，不利于信徒与他直接对话，同时从汉族的佛教信徒来讲，也需要有一个懂得汉语的菩萨，以便能直接将汉族民间的苦难和功德向阿弥陀佛汇报，使得阿弥陀佛的接引安排也能“毫发不爽”的精确。这样，观世音的国籍、民族，甚至性别，就按照汉族信徒的愿望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南北朝时，佛教在中国有了迅速地发展，比丘尼(受戒的尼姑)和优婆夷(指一切接受五戒的在家女居士，亦通称一切在家的佛教女信徒)人数骤增，北魏的灵太后等都笃信佛教。在这种现实情况下，为了适应妇女也能通过修行到达“西方极乐世界”的愿望，菩萨中就出现了一个“妇女代表”，这个菩萨名号就是“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随着观世音女身形象的出现，有关观世音来历的神话传说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到北宋年间，观世音菩萨的“前身”已被传说成春秋时期楚庄王的三女儿妙善。妙善从小孝顺父母，父母爱她如掌上明珠。后来，楚庄王得了重病，虽然请名医诊治，但仍旧日见沉重，毫无起色。妙善为了救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终于治好了楚庄王的病。楚庄王痛惜心爱的女儿，就封妙善为“大悲佛”，后来也就成了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了。

宋朝以后，随着我国封建伦理纲常观念的日益加深，在信佛的妇女闺房里供上一个男性的菩萨，显然不符合“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观念。因此，女性的观音就成了女信徒们虔诚供奉的一尊慈祥可亲的偶像了。

三

从上述观音菩萨的演化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观音信仰的形成也和佛教在中国流传并日渐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融合的过程大体一致，即在保留佛教经典中有关观音菩萨的若干基本特征的基础上，融合了汉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如乐善好施、乐于助人、互相帮助、扶危济困等等。尤其是观音菩萨形象上的变化，更加适应了中国民众的心理，从而使广大民众更加容易接受并进而形成包罗万象无所不能的观音信仰。那么，观音信仰究竟应当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首先，降妖除魔是观音信仰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内容。据“万历碑”所载，修建观音堂的地方原名蝦蟆石湾，由于“怪物数扰害其间”，以致“民用不宁，道路阻塞”，只是因为观音菩萨“现丈六金身”，从此“妖魔降灭，地方宁谧”。可见，正是由于观音菩萨的出现，才使得原先在这一地区祸害百姓的妖魔鬼怪销声匿迹，百姓得以正常生活。这不仅成为修建观音堂的最初动机，也成为日后观音堂在明清两代 300 多年间一再修葺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护佑众生，拯难救灾是观音信仰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在大同观音堂现存的众多碑刻中，无论是“万历碑”还是“顺治碑”，抑或乾隆、道光、光绪乃至宣统时的碑刻，在谈到树碑或捐资维修的原因时，几乎无不提到观音菩萨“方便拯救”“随声解危”的无边法力。因为在这些人看来，他们所遭受的种种的苦难，不管是来自自然界的，还是来自社会的，都可以通过对观音菩萨的祈祷而得以解脱，实现其消灾避祸的目的。

第三，观音菩萨还可以帮助人们实现“发财致富”的梦想。在观音堂现存的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的《重修观音堂碑记》中记载，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时，“有申君诏自外营归，祷于斯而有应也”，遂“捐大钱五十五千”作为维修观音堂的费用。从这则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姓申的捐资者恐怕只是一个小本经营的商人。按照当时的银钱比价，一千铜钱大约折合一两白银。这位商人捐出约折合 55 两白银的铜钱，对他来说恐怕不是一个小数目，但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祷于斯而有应也”，即他得到了观音菩萨的保佑，实现了他的小小的“发财”梦想。关于这一点，镌刻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重修观音堂碑记》中所附的《新创修财神殿碑记》中说得更加清楚。据该碑文记载，当时大同城内“德兴永铺伙勤俭求财，得蒙神佑”，遂于“观音堂庙内西南角创修财神殿，以报神庥”。

除此之外，人们在生育、保健等方面有所期望，也要求诸观音菩萨，正如“万历碑”中赞颂观音菩萨的无边法力时所说的那样，“一切兵戈水火险盗狂鬼之害，以至寿考富贵子女之术，莫不罄我愿力，付顺兆情”。这就是说，不管人们有什么愿望和要求，在观音菩萨那里都可以得到满足。这就使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观音信仰会在大同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远远超过其它自然的或人为的神灵，形成“唯我独尊”的信仰崇拜呢？

首先，这和明清时期各级封建政府的倡导有密

切的关系。在明代,观音信仰和对观音菩萨的祭祀是被封建统治者确认的列入祀典属于正神范畴的祭祀对象,与关帝、真武大帝和碧霞元君为香火最盛的神。然而,在大同地区,根据明正德八年(1513年)张钦所撰《大同府志》卷四“寺观”所载,在今大同市城区及周边地区,除观音堂之外,并无关帝、真武和碧霞元君的寺庙。由此可见,观音崇拜在大同地区已经远远超过了其它神灵。这正如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刘献延在其《广阳杂记》卷四中所说:“举天下之人,下逮夫人孺子,莫不归心向往,而香火为之占尽。”

其次,明清时期大同地区观音信仰的兴盛还与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大同地区地处黄土高原的北部,常年干旱少雨,无霜期较短。这种气候特点,对于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形态的大同居民来讲,风调雨顺就意味着生存有了基本保障。然而,对于生活在封建统治之下的贫苦农民来讲,他们的这种期望不可能寄托于各级封建官府,故而只能将其寄托于虚幻缥缈而又在他们心中充满无限希望的观音菩萨身上。

再次,大同地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自明代以来,大同及其周边地区经常成为来自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南下掳掠的目标,明王朝中央政府为此采取了很多措施,但都收效甚微,双方的对峙持续了将近两个世纪。尽管这种敌对状态是由于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战争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尤其是生活和居住在大同地区的普通民众而言,则意味着杀戮和死亡的威胁时刻

笼罩在他们周围。他们在呼天天不灵,呼地地不应无可奈何的状态下,只好把自己和家人的生命交给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了。

最后,还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我国古代民族融合的中心地区之一的大同,观音堂也是历朝历代民族融合的历史见证。因为无论是“顺治碑”所说的大同观音堂“创於拓跋氏”也好,还是“万历碑”所说的“辽重熙年”也好,都认为大同观音堂的观音菩萨是从“秦之万佛洞飞来”。“秦”是我国古代对西北地区的简称,而西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华夏族以外的其他民族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因此,这个由“秦之万佛洞飞来”的观音菩萨,必然或多或少地携带了少数民族文化的气息。因此,在它建成之后,参拜它的不仅有生活和居住在大同地区的广大汉族各阶层的民众,而且还有其它民族的各阶层人士。关于这一点,“顺治碑”领衔并带头捐资维修的清宣大总督佟养量,不仅是当时大同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而且也是一个满族贵族。此外,在清道二十三年(1843年)的《重修观音堂碑记》中,还记载了当时任御前行走的阿拉善和硕特额勒特扎拉克、和硕亲王玛合巴拉及其子、贝子职衔头等台吉囊都素布隆在进京途中“路经瞻拜”,捐资白银50两,并“代化众善士大钱二百七十千”的经过。可见,观音菩萨在蒙古族各阶层民众中也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和众多的信众。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大同的观音堂实际上是一个融合了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情结的历史见证人。

参考文献:

- [1](明)张 钦. 大同府志[M]. 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 1986 年重印本.
- [2](清)胡文焯. 云中郡志[M]. 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 1988 年重印本.
- [3]陈宝良, 王 熹. 中国风俗通史(明代卷)[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5.
- [4]林永匡, 袁立泽. 中国风俗通史(清代卷)[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 [5](明)申时行. 明会典[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Guanyintang and Guanyin Worship in Datong Area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GAO Xiao-feng

(Ancient Architecture Reservation Center of Datong, Datong Shanxi, 037000)

Abstract: Guanyintang is a Buddhist temple for people to worship Goddess Guanyin in Datong, regarded as the earliest built and now preserved. From the inscription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evolution of Guanyin worship could be understood, and the reasons why Guanyin worship was popular,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during the two dynasties could be also seen.

Key words: Guanyintang Temple; inscriptions; belief

[编辑 赵立人]